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izhengqijian
zhizhengdang
yushehuiguanxi
yanjiu

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 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

师晓霞◎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izhengqijian
zhizhengdang
yushehuiguanxi
yanjiu

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 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

师晓霞◎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 / 师晓霞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115-0022-9

I. ①中… II. ①师… III.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①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0065 号

书 名: 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

著 者: 师晓霞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鞠天相

特约编辑: 李林华

封面设计: 东方资治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38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34 千字

印 张: 9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022-9

定 价: 25.00 元

前 言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西方学者的话语霸权，政党政治的研究预设了两党或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前提条件，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常常被西方学者视为不成熟或过渡性的政党政治。法定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几乎被排除在政党政治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并没有像西方学者所预言的那样效能低下甚至短命，相反却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和很高的政治效能。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就足以说明。作为领导世界上最大政治体的现代政党，中国当今现代政治中最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国政治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政治的发展，无疑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作为社会中重要的政治利益聚合者和协调者，政党连接着国家与社会，是政治活动的“运动轴心”。^[1]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党政治最基本、最核心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宪政架构下，由于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政党如果与社会相脱离或不能反映足够的社会民意，就意味着下台。一党长期执政，尤其是法定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执政党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政党与社会相脱离、相异化的现象就很容易发生。执政 60 年来，在政党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共产党有经验，也

[1] 参见唐晓、杨帆：《政治科学基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第 101 页；施雪华主编：《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26 — 334 页。

有失误，值得深刻总结。从执政之初政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的逐渐形成，到改革开放后三位一体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的逐渐解构，再到新的政党、国家、社会三者良性互动新的政治形态的孕育和生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状态，不仅能够折射出中国特定政治形态更本质的东西，直接影响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威，也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近些年来，无论是从政党政治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提高执政效能，转变执政方式的角度，许多学者和党建一线的工作者都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思考，其中涉及关于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很多见解、观点颇有启发。本文试图借鉴各家之说，采用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全面、系统解读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变化，分析这对关系在中国社会政治形态乃至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回顾、主要模式及变化趋势	1
第一节 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回顾	2
第二节 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模式	9
第三节 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对策及其未来趋势	16
一、政党与社会关系变化及其成因	17
二、主流政党重塑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对策	21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	26
第二章 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与社会的关系（1）	33
第一节 “政党主宰”的政党与	
社会关系模式形成的客观背景条件	34
一、经济——工业化资源不足	35
二、政治——公共权威衰败	36
三、社会——“一盘散沙”，低度组织化	38
四、历史文化传统	
——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各有其领域和边界的意识不强	39

第二节	“政党主宰”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形成的主观因素···	41
一、意识形态·····		41
二、治国方略·····		43
三、组织能量·····		45
第三节	“政党主宰”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过程·····	47
一、雏形阶段·····		48
二、成型阶段·····		51
三、巩固、发展和调整阶段·····		54
第三章	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与社会的关系(2) ·····	59
第一节	“政党主宰”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	59
一、政党社会一体化·····		60
二、政党权力化·····		61
三、社会组织化·····		62
四、社会政治化·····		62
五、政党与社会关系行政化·····		63
第二节	“政党主宰”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历史作用·····	65
一、经济发展·····		65
二、政治稳定·····		67
三、社会整合·····		69
第三节	“政党主宰”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弊端·····	71
一、经济规律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71
二、社会自主功能丧失,社会生态破坏·····		72
三、权力高度集中,政党功能紊乱,政党政治影响力衰竭·····		73
第四节	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灾难成因分析	
——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角度·····		76
一、三年大饥荒·····		77
二、文化大革命·····		79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与社会的关系(1) 85

第一节 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由“政党主宰”

向“政党领导”转型的背景 86

一、经济背景 86

二、社会背景 88

三、政治背景 89

第二节 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由“政党主宰”

向“政党领导”转型的过程 91

一、旧体制退出阶段(1978-1987,
即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大) 92

二、新体制探索、调整和重新定位阶段(1987-1997,
即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期间) 94

三、新体制制度创新阶段(1997-2007,
即党的十五大至十七大) 97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与社会的关系(2) 103

第一节 “政党领导”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模式的特征 103

一、回归政治 104

二、“去行政化” 105

三、回应性 106

四、法治化 107

第二节 完善“政党领导”的政党与

社会关系模式相关的几个重要的制度安排 109

一、选举制度 110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112

三、党内民主制度 115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未来趋势展望 119

一、“政党主导”的基本特征不会改变 120

二、一党领导下多元利益表达和综合机制趋于成熟 120

三、制约监督执政党的体制内、体制外渠道良性互动·····	122
四、执政党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机制趋于完善·····	124
五、政党回归社会·····	125
参考文献 ·····	129
后 记 ·····	135

第一章 政党与社会关系的 历史回顾、主要模式及变化趋势

政党堪称近代以来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分野点”。^[1] 尽管中西历史上都存在过某种以“党”为名的政治团体，它们确实也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但它们与现代政党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借用生物进化的语言，可以说，政党是人类政治文明进化过程中一次意义极其重大的突变。人类政治生态因政党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政治运行的规则变了，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传统的或新生的，都发生了剧烈的分化、聚合和重组。

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关系，人类政治生活最古老的一对关系，长期以来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党这个国家与社会之中介出现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分化为政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制约着政党与社会关系，反过来，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同样改变了政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对于一国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从政党政治产生以来，人类各政治共同体，在处理政党与社会关系问题上有着十分丰富的实践，充分展示了人类的政治智慧和创造力。当然，一国的政治实践总是

[1] [英]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20页。

与特定的国情相连的，但是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政治形态还是有着共同的特性和规律。所以，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之前，有必要在政党政治的大背景下对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一般性的探讨。

第一节 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回顾

政党的定义非常多，但总体而言，西方理论界或者受西方影响的地区基本上都将“政党”放置在多党竞争、议会（总统）选举的政治系统之内考察，视这些条件为“政党”的“应有之义”。^[1]我们不同意西方理论界对

[1] 西方学者所下的“政党”的定义很多，兹简单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英国政治家柏克（E. Burke）认为“政党基于大家所一致同意的某种特定主义，以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结合的团体。”

美国学者魏尔克（H. Walker）认为“政党为一个对于公共问题具有相当理想之选民所组成的团体，彼等企图透过各种公职之提名与选举，以实现共同的理想。”

穆尔斯（A. D. Morse）在其著作《政党与政党领袖》中指出“政党乃一永久之组织，其结构有简有繁，其最简单之结构，乃由具有共同理想与主义所结合而成之单一团体所组成；其复杂之结构，则系由两个以上之类似团体组成，并以共同政策为纽带，故能团结在一起。此种之组织常与原先所具有之观点有别，以促进政党所代表之特定团体的利益，与实现此种特定团体之理想为其主要之目的。惟政党所代表者，为特定之团体，而非全体之国民。”美国学者赫其南（D. G. Hitcher）和哈波德（W. H. Harbold）认为“政党是一种自愿之结社，经常关心政府之职权与公共之政策，并为自由政府提供如何组成其所需要多数之方法。因为政党仅是代表一部分——竞争中之一方，所以它必须承认其它政党之存在。”

美国学者何尔康比（A. N. Holcombe）认为“政党为全体国民之一部分人联合团结，以期更有效追求他们自己之特别利益。他们采取似乎最有利他们，而且最有成功希望的那些权宜方法以行之。对于达成目的之方策的选择，他们可能或不可能完全同意，但他们至少必须同意共同行动之有效办法的抉择。纵然在他们之间牺牲许多折中歧见的机会，乃至政治上毫无拘束，而完全自由以为其所欲为。”

美国学者波恩（H. A. Bone）认为“当一群人们联合团结，经由选择秩序、略取政府之控制权，以期图谋一种（公共）利益者，是即称之为政党。”

美国学者庆恩（D. D. McKean）认为“一个政党可以视为选民的一种有组织之团体，其作用是在指导政府政策，并供应政府人员。”

以美国政治科学学者为代表的西方观点基本上都将政党放置在议会、选举的政治大环境中考察，视竞争性选举为政党存在的当然前提。台湾学者受此影响的也比较多：

政党概念先天预设“轮流”、“多党”的含义。这类定义仅仅概括了一些国家政党政治形态，而将世界上更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形态摒弃在外，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英国政治家柏克将政党定义为“政党基于大家所一致同意的某种特定主义，以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结合的团体。”^[1]相对而言，柏克的定义更为灵活，更具概括性和兼容性，更容易让人接受。西方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的定义则更为灵活，在制度上仅将政党定义为“个人之成为集体政治行动者的场所”，在功能上仅定义为“表达和聚集政治要求的政治联盟”。^[2]

浦薛凤认为“政党者，乃由于无数个人或许多团体所联合组成，具大规模及永久性的公开政治会社，努力取握政府之治权，并求所以实现其所持之主义与政策。”

萨孟武认为“政党是一部分国民要利用统治权，以实行一定政见而组织的较永久性团体。”

张金鉴认为“政党就是一部分人要以集体的努力与奋斗，去争取民众，控制政府，借以实现其共同之政治主张，依志愿结合成功的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

马起华认为“政党是一部分成年国民为取得政治权力，控制政府组织，以实现其政党的理想而组成的一种政治团体。”

谈子民认为“政党乃一部分国民依据其志愿所组成之政治团体。彼等欲以其共同智慧与努力，透过各种公职候选人之提名与选举，略取政府权力，以实现其共同之政治理想与主张，并促进国家民族之利益。”

江炳伦认为“严格地说，真正的政党应该具备下列四个条件：（1）组织在时间上有其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的逝世而鸟散崩析。（2）有明显且长久性的地方组织；在中央与地方机构之间，有固定的沟通渠道和关系存在。（3）组织的目的，不仅是为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已，如利益集团，而且要为取得政权或维护既得政权而努力。（4）企图使更多的人信服和跟从党所提出的政纲，俾在选举时能获得普遍的支持。”

程全生认为“政党者，实乃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要以争取民众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与手段，以促进国家利益实现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足以充分显示政治功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至少应具备抽象与具体两方面的要件：（一）抽象方面——理想（奋斗的至高目标及其可行的途径）、抱负（促进国家利益及国民公益的决心）、动力（成员意志的总汇合）（二）具体方面——党人（领袖、干部、党员及其结构）、政（党）纲（正确的号召，指导政府政策）、职权（依法一或多数人民意愿一控制政府实现政治理想）。”

以上资料皆来自程全生：《政党与政党政治》，[台湾]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4年，第9—13页。

[1] 同上。

[2] [英]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李雪等译，浙

除了西方学者提到的理想、组织等要素之外，必须强调“谋求控制政权”是政党最本质的要素。把握这个要素，可以概括世界当今存在的大多数政党组织，也可以将政党与利益集团等组织区分开。利益集团谋求影响政策而不是控制政权，如果利益集团图谋控制政权那就完全可以以政党称之了。而且，必须注意的是，政党的阶级属性，谋求控制政权的实质是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机器而统治其它阶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充分揭示了政党的阶级属性。^[1]

“社会”的定义也很多，为研究之便，我们选择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相关定义。社会是“指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范围内除国家机构与制度（组织与安排）之外的个人、他们之间的群体以及这些构成体之间的联系的总和”。^[2]这个定义的要点是“国家机构与制度（组织与安排）之外”，换言之，即国家强制力控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在近现代政治学语境当中，人们总是将社会当作与国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来使用，也称为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公民社会就是指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也就是当代社会中的非政治领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并不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区隔，而是人们整体生活的不同侧面。个人作为国家成员与社会成员身份也并不排斥，是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

政党的雏形最早出现在英国。17世纪英国议会因王位继承问题形成的两大派别：托利党、辉格党，被认为是最早政党的雏形。但是人们一般认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在200多年政党政治发展史上，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纷纭的面貌，文化传统不一样，

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

- [1]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政党的定义，可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470—472页。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党的阶级属性的论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可参见赵晓呼主编：《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18页。
- [2] 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都会影响到政党与社会关系。极而言之，可以说，历史上存在过多少个政党就有多少种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不过，拨开复杂纷纭的历史迷雾，还是可以梳理出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演变的大致脉络。

研究政党政治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政党进行分类，其中法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从组织机构角度对政党分类具有较大的影响，他的这种分类方法已经被广泛使用，公认为政党分类最重要的模型。^[1]迪维尔热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分政党为“干部会议”、“支部”和“基层组织”三种类型。迪维尔热的分类，既有逻辑学的意义，即对曾经存在的政党进行归纳整理，也体现了政党演变的历史顺序，兼顾了诸多重要的理论内容。我们可以借助迪维尔热的分类框架来回溯当代中国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演进过程。考虑到“支部”和“基层组织”在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中常常理解为一回事，难以明晰表达迪维尔热的本意，所以我们将“基层组织”形式的党改用“细胞党”党的说法。我国研究政党政治的学者周淑真就采用这个说法。^[2]

干部会议党。迪维尔热也称之为“干部党”或“内部党”。所谓干部党，意指少数社会名流所组成的党。所谓内部党，意指产生于立法机构内部。

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可以作为这类政党的一个原形，但是托利党和辉格党都还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只不过是观点相合的议员的临时聚会，充其量不过是议员加上一些社会名流的小团体。托利党和辉格党脱离“朋党”的痕迹，转型为现代意义的政党那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情。1830年以后，英国公民选举权的逐步扩大，为了获得足够多的选民支持，

[1] 参见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3rd Edition, London: Methuen, 1964. 关于迪维尔热政党分类学说简要的内容和评价，可参见[英]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27—528页；[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4—38页；[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

[2] 参见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托利党改用保守党的名称并于 1833 年率先建立了第一个保守党的地方组织, 1867 年保守党召开全国大会。辉格党 1834 年启用自由党名称, 70 年代才开始建立地方组织, 1877 年召开自由党全国大会。至此, 两个党转型成功。^[1] 美国不像英国政党那样经过漫长的转型过程, 美国选举权扩大几乎与国家建立同步, 政党建立之初就面临建立地方分支机构以争取选民的问题。所以 1800 年美国新选举法实施时, 我们就看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以现代政党的面目登上政治舞台。^[2]

以“干部会议”为基本组织形式的政党, 有干部没有党员, 尽管各政党也招募一些人员作为竞选工作人员, 但这些人并不一定认同党的主张。所以并不能以党员相称。上层有党, 基层无党。整个党组织是为竞选的目的而存在。竞选前和竞选时有党, 竞选后无党。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 “干部会议”的党开始突破前政党时期“朋党”的封闭状态, 与社会有了某种联系, 社会的政治诉求可以通过政党这个新的政治构件输入政治体系, 政党也可以通过自身体系发挥某种社会功能, 但是这种关系只能是“感应性”的, 而不是制度性的。所谓的“感应性”的, 说的是双方有某种关联, 但是很不稳定, 时断时续, 缺少稳定的、经常性、规律性、制度性的关联。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公民参与意识的增长, 为了争取选举的需要, “干部会议”的结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 所以, 我们看到这种政党类型在许多国家很快衰落被新的政党类型所代替。但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类型的政党居然在最早建立现代政党制度的美国保存下来。所以有的学者称美国的“干部会议”类型的党为政党的化石。^[3]

支部党。迪维尔热也称之为“群众党”或“外部党”。从成员结构的角度, 都有比较稳定的社会成员基础; 从渊源上都产生于立法机关外部或政治体

[1] 与 19 世纪相比, 当代英国政党政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代英国政党政治及其对政府的影响, 参见 [法] 布隆代尔、[意] 科塔:《政党与政府》, 史志钦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20—35 页。

[2] 参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234—264 页;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64—71 页。

[3] 参见 [美] 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 罗飞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1 年, 第 34—38 页。

制之外。

“支部党”是欧洲社会党人的创造。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同属于社会党谱系，都采用支部的组织机构。“支部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通过复杂分工牢牢地束缚住其成员，并一贯强调上级的控制。”^[1]支部的组织化程度要高于“干部会议”，党员与组织有了固定的联系，有一定的纪律要求。“党员”这个身份角色本身就是“支部党”的一个重要识别标志，意味着政党与其成员之间是一种组织化的联结，不同于“干部会议”政党只是选举人与候选人之间的松散联系。

欧洲社会党渊源于1864年马克思在伦敦成立的欧洲共产主义同盟。工业革命带来了欧洲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19世纪初欧洲发生了两大阶级的激烈对抗与冲突。马克思主义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欧洲共产主义同盟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产生了。以工人阶级为其社会基础的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比较起来，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稀少，必然求诸于组织化，以比资产阶级政党更高的组织化的程度来增强政党的力量。当今欧洲的社会党，无论从社会基础还是意识形态已经很难辨识出当年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的痕迹了，但是“支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被保留下来并作为社会党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实，支部的组织形式不仅仅是社会党的特征，它已经被大多数现代政党所采用。

支部党改变了“干部会议”上层有党基层无党，选举时有党选举后无党的松散局面。支部是一种比较开放的结构形式，“新的支部成立，便吸收相当多的成员，试图在公众中为自己建立一个广泛的基础。对于比较广阔的社会，它总是寻求一种开放的姿态，希望由此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永久而又广泛的联络点，能够动员人民加入各种行动”^[2]。支部与“干部会议”比较起来更加民主，支部领导人一般由选举产生，党员在党的内部事务中

[1] [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张华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

[2] 同上。

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显然，支部的组织形式，为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社会诉求能够通过政党这个专业化的机构输入政治体系，政党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组织化来更好的履行整合和领导社会的功能。

细胞党。“细胞党”是共产党人的创造。共产党与社会党同宗，源于马克思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同盟。社会党分支放弃了暴力革命推翻现体制的道路，采用议会斗争。共产党分支坚持反体制斗争，并于1917年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细胞形式的政党不仅是持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共产党采用，其实从创立后已经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党的普适形式，中国共产党更是其中的典型。^[1]

细胞党与支部党一样，组织化程度较高。除了具有社会基础广泛、党员与组织联系紧密等共同特征外，迪维尔热认为“细胞党”还具有两个支部党不及的特点：第一，细胞党以职场为基础建立，支部以选区或行政区为基础建立。第二，细胞党的规模一般比支部小。这两点使基层组织的党具有比支部党更强的内聚力，成员对组织的心理忠诚度也更强。^[2]迪维尔热还认为，细胞党的出现，“反映了政党这一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立干部会议主要是为了争取选举的胜利；建立支部除了选举胜利外，是为了在公众中建立一个广泛的基础，赢得追随者；建立基层组织（细胞党）则是作为一种推翻现在的政治制度的手段。”^[3]迪维尔热将政党功能与政党组织结构形式联系起来的思路是极富深意的。

细胞型政党组织化程度最高，与社会的关系最为紧密，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最大。通过具有忠诚度的成员和以职场为依托的细胞型组织，政党将自身的体系牢牢地嵌入社会结构当中。这种一体化的政党与社会关系，有利于将社会诉求输入政治体系，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动员，将政党的

[1]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形式的详细描述以及与西方典型议会政党的比较，参见郭亚丁：《政党差异性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比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85—116页

[2] 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张华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2页。

[3] 同上。